

---

# 被遗忘的危机：1944年中美两国在 谈判贷款和在华美军开支问题上的争吵

任东来

---

1942—1943年无疑是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的“蜜月”。继1942年4月美国对华贷款5亿美元之后，1943年1月中美双方达成废除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中美平等新约》；10月11日罗斯福又向美国国会提出废除不光彩的“排华法”；11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不惜以减少租借援助相挟，促使苏联同意中国以四强之一列名于《四国普遍安全宣言》。接着，蒋介石又受罗斯福之邀，参加开罗中美英首脑会议。中美抗日同盟的“蜜月”进而发展到顶点。但物极必反，开罗会议也成为战时中美同盟关系的“分水岭”。<sup>①</sup>从此，中美关系开始走下坡路，双方分歧愈来愈大，争吵愈来愈烈，最终在1944年酿成了一场从财政到军事，从军事到政治的中美关系全面危机，一度威胁中美同盟的存在。

这场危机集中体现于1944年发生的两起重大事件：一是史迪威事件；二是中美两国在美国贷款及美军在华开支问题上的冲突。国内外学术界对第一个问题研究很多，但对后一个问题注意不够，

---

<sup>①</sup> 这一提法最早见于美国官方陆军战史，见查尔斯·罗马纳和瑞利·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C. Romanus and R.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华盛顿，1956年版，第49页。

研究也不深入。<sup>①</sup>实际上,这一危机延续时间之长,冲突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并不亚于史迪威事件。本文将利用中美两国已刊的外交文献对此作一较为深入的研究,以填补抗战史研究中的这一空白。

### (一)

寻求美国的财政援助一直是战时中国对美外交的目标之一。1942年中国争取到美国5亿美元的贷款,并在贷款使用上成功地给“美国规定了条件”。<sup>②</sup>基于这一经验,1943年底,蒋介石借开罗会议之际,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再借10亿美元给中国的要求。在临时准备的“救济中国经济之办法”的备忘录中,蒋介石指出,1942年的5亿美元贷款事实已指定好用途,而中国政府因战事过长,开支剧增,加上修建美国战略空军基地<sup>③</sup>及支付在华美军开销等项,通货膨胀日益加重,“故今日非向美续借美金十万元,以补充法币一部分之准备。如此军需与民生方是勉资应付,乃得完成最后之胜利”。<sup>④</sup>

但罗斯福这时对蒋介石的态度远非1942年时那样热情。他曾

① 笔者尚未见到国内有关这一问题的专著或专文。美国有几位学者在其著作中涉及了这一问题,但不够全面、完整,没能利用中文材料。见布卢姆:《摩根索传:战争年代1941—1945》(J. M. Blum, *From the Morgenthau Diaries, Years of War, 1941—1945*),波士顿,1967年版,第87—121页;杨格:《中国与外援,1937—1945》(A. Yong, *China and Helping Hand*),坎布里奇,1963年版,第279—298页。

② 1942年2月中美关于美国5亿美元贷款协议的谈判中,美方最初要求中国在贷款动用以及有关技术问题上需与美方商量。但中方坚决反对把这一内容写入协议,美方非常不情愿地放弃上述立场。中国一决策者认为这是中国给美国规定了条件。详见拙作:《1942年中美5亿美元借款始末》,《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第5期,第33—40页。

③ 根据1943秋美国军方制订的“马特亨”(Matterhorn)计划,中国开始帮助美国在成都等地修建美国战略空军第二十轰炸机大队的基地。该计划打算以中国为基地,用B—29轰炸机对日本本土、台湾和中国东北的日本工业基地进行战略轰炸。

④ “开罗会议政治问题会商经过”,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凡引此书简称《战时外交》)(三),台北,1980年版,第533—534页。

在私下向他的密友、副国务卿萨姆·韦尔斯抱怨，他在与蒋的交往中经历了“无数困难”，说蒋政权“腐败无能”，对“中国民众的苦难之缺乏同情”已使他无法忍受。<sup>①</sup>因此，对蒋介石的要求，罗斯福以国会难以批准为由加以拒绝。不过，他也考虑到利用其他办法，比如美国直接购买中国法币来帮助中国渡过财政困难。<sup>②</sup>

罗斯福的婉拒并没有使蒋介石放弃求援努力。随后的事态发展为中国的求援提供了合适的借口。开罗会议结束后不到十天，罗斯福便代表美英方面通知中国，取消其在开罗会议上对中国所作的承诺：1944年3月美英方面在南缅孟加拉湾发动代号为“海盗”(Buccaneer)的两栖进攻。<sup>③</sup>“海盗”计划是开罗会议通过的盟国南北夹攻缅甸方案(代号为安纳吉姆 Anakim)的一部分，主要是配合以中国军队为主的盟军在缅北进行“泰森”(Tarzen)战役。<sup>④</sup>

自1942年缅甸沦陷后，中国政府就一直努力敦促西方盟国开辟缅甸战役，打通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开罗会议最终通过了缅甸战役的决定，但现在西方盟国又自食其言。因此，罗斯福的电报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他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把它作为争取10亿美元贷款以及增加对华“驼峰”空运量至2万吨的砝码。蒋介石在同意取消海盗计划的同时不无威胁地指出：“因中国战区之危机不仅在于军事之薄弱，而经济之危机更足以影响战时军民心理之动摇，随时招致整个战局之崩溃。照目前形势，无论军事与经济，决不能支持半年之久，……其惟一可能之解决办法，即为中国军民保证阁下之十分诚心关切于中国战区，与协助中国继续抗战，而继续

① 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在华经历 1911—1945》(B.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纽约，1972年版，第524页。

② 白修德编：《史迪威文件》(H. White, *Stilwell's Papers*)，纽约，1948年版，第251—252页。

③ 罗斯福致蒋介石电，1943年12月7日，《美国外交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年中国卷，华盛顿，1957年版，第178页。

④ 盟国关于开辟缅甸战役的计划和讨论非常复杂，几经修改和反复，可参见梁敬𬭚：《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112—182。

贷予十万万美金之借款，藉以增强其经济之阵容，并解决其经济上迫切之需要”。<sup>①</sup>

华盛顿尚未对此作出反应，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思得悉这一消息后，急忙向国务院发了一份很长的分析报告，强调“目前没有任何政治或经济上的理由来支持这一贷款建议”。首先中国政府和私人并不缺乏美元储备。再从上次 5 亿美元贷款的使用来看，很难相信中国政府会很好地利用新贷款。从政治讲，美国不必再担心中国会单方面与日本媾和，因为中国已跻身于“四强”之列，并得到盟国收复失地的保证。高思进一步指出，任何对中国局势长期观察的美国人都会认为：(1) 中国政府正在“竭力利用美国现存的慷慨和善意”为己牟利；(2) 中国许多官员认为中国已单独抵抗日本六年多了，“现在该让美国承担战争负担了”；(3) 中国目前正在为有关战后经济计划的讨论，“倾向于一种只对中国有利的封闭经济”，而不准备遵守它一再保证的“世界经济中的自由、互惠原则”。中国政府的这一态度，促使它在战争中不去尽力而为，甚至也不愿全心全意与在华美军合作。美国因此不得不为成都的机场建设支付比实际费用高出 8—10 倍的开支。美元与法币 1 : 20 的不合理汇价，使美军在华每开开支高达 2000 万美元，“而中国同时却以我们为代价建立起可观的美元储备”。<sup>②</sup>

高思的分析没能在国务院引起积极的反响，但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却不约而同地与他持同样的见解。根据罗斯福的要求，摩根索就中国的贷款要求准备了一份“极为坦率”的备忘录。他指出：中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战时需求过大及主要消费品生产严重不足，因而罗斯福购买中国法币的建议无济于事。中国利用 5 亿美元贷款来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发行美金公债和出售黄金——被

---

① 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3 年 12 月 9 日，《战时外交》(三)，第 287—288 页。

② 高思致国务卿赫尔电，1943 年 12 月 9 日，《美国外交文件》，1943 年中国卷，第 476—479 页。

事实证明是无效的，只是养肥了有特权的个人。中国在美国尚有4.6亿美元储备，同时每月还得到在华美军支出的2000万美元，因此贷款并无必要。他建议采取下述两种办法来减轻通货膨胀：“(1)鉴于在华美军每月开支已达4亿法币，相当于中国货币发行量的1/10强，因而可用美元直接在市场上购买这笔法币；(2)把每月从美国向中国运输黄金的数量由目前的600万美元增加到1200万美元，这样黄金出售后可回笼35亿法币。”<sup>①</sup>

罗斯福没有立即把摩根索的备忘录送给中方。他在12月20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强调了一件更为紧迫的事情，即请蒋介石下令遣发滇西中国远征军，配合史迪威正在进行的缅北战役。他还保证“驼峰”空运将从11月的7300吨增加到12000吨，并顺便提及美国财政部正在研究中国贷款要求及财政问题。<sup>②</sup>实际上他和财政部此时都已决定拒绝中方要求。罗斯福这样说，显然是想引诱蒋介石在滇西出兵。

但蒋介石对缅北战役毫无兴趣。他以南缅无登陆行动配合为由拒绝罗斯福的请求，同时再次强调财政援华的重要性：“由军事及经济方面观之，明年均为中国战区最危急之一年。余恐此战区不利之转变，势将影响于太平洋整个战局形势也。”<sup>③</sup>他还特别请高思大使向美国财政部和陆军部报告，如不支持中国货币稳定，其结果会造成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崩溃。但高思在汇报蒋介石这一看法时，仍然强调：“美国此时贷款无助于中国的经济形势，只有广泛和成功的军事行动才能做到这一点。”<sup>④</sup>

但美国国务院并不同意其驻华大使的意见。它在给罗斯福的

① 摩根索致罗斯福备忘录，1943年12月18日，《摩根索日记（中国）》“Morgenthau Diary (China)”，第二卷，华盛顿，1965年版，第944—945页。

② 罗斯福致蒋介石电，1943年12月20日，《战时外交》，(三)，第287—290页。

③ 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3年12月23日，《战时外交》(三)，第299—301页。

④ 高思致赫尔电，1943年12月23日，《美国外交文件》，1943年中国卷，第482—484页。

一份文件中强调，鉴于中国可能是美国战后最可靠的朋友，以及打败日本还需要时间，美国应该把军事和政治的考虑置于经济考虑之上。它建议说，美国或许可以把蒋的贷款请求作为美国与蒋讨价还价的砝码，来讨论战后中国重建问题，而不应该简单地拒绝这一请求。美国最好向中国派出一个特别小组，或建立一个中美联合委员会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如果美国提供贷款的话，这笔贷款应和美国参与中国战后重建的重要目标相联系，而这种联合委员会或许可以发展为这种合作的机构”。<sup>①</sup>

国务院的考虑不可谓不从长计议，尤为符合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希望中国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思想。因此他在 1944 年初劝摩根索多方考虑，不要急于向中国发出财政部的备忘录。赫尔认为，提供贷款可能是稳定中国局势的最廉价的办法，并提出向中国派遣使团的想法。但摩根索认为，这种使团在目前“中国政府由腐败家族统治的情况下，不会有任何结果”。他坚持主张把财政部的备忘录送交中方，因为罗斯福已经批准。赫尔还是想把备忘录的语气改得和缓些。但摩根索不客气地说，如果赫尔想修改，就请去找总统。<sup>②</sup> 他在日记中忿忿不平地写道：“我们（指他和罗斯福——引者）并没有请赫尔作评论，只是请他送走备忘录。……我感到这整个过程十分荒谬。”<sup>③</sup> 但赫尔还是说服罗斯福由高思亲手转交这一文件，并向蒋介石口头声明罗斯福对中国的诚意，以减少这份文件的刺激性。<sup>④</sup>

罗斯福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除了摩根索的备忘录的全部内容外，也增加了国务院的建议，即“派出一个第一流的委员会访问重

---

① 国务院准备的文件，1943 年 12 月 27 日，《美国外交文件》，1943 年中国卷，第 484—489 页。

② 《摩根索传》，第 112 页。

③ 摩根索 1944 年 1 月 5 日日记，《摩根索日记（中国）》，第二卷，第 1015 页。

④ 赫尔致摩根索函，1944 年 1 月 4 日，《美国外交文件》，1943 年中国卷，第 826—827 页。

庆”，以便与中方讨论有关问题。<sup>①</sup>

## (二)

罗斯福的电报表明，美国不仅拒绝中国的贷款请求，而且还无情地批评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这大大损伤了中国领导人的自尊心。因此，不论是罗斯福派员来华的建议，还是高思大使的口头解释，都无法减少蒋介石的愤怒。

他在 1944 年 1 月 15 日给罗斯福的回电同样是“非常激烈，……非常强硬”。尽管财政部长孔祥熙和财政部美籍顾问杨格试图使电报的措辞缓和些，但没有成功。<sup>②</sup> 蒋介石明确指出：美国财政部的建议“实类似一种商务上之交易，而非一同盟国与他同盟国应有之办法。如果付之实施，不惟不能加强中国抗战之力量，反而损毁中国人民对于法币之信仰，以加重经济之困难而已。”因此，他提出最后通牒式的建议，或者美方贷款 10 亿美元，以减少中国财政赤字并帮助在华美军的开支；或者由美国政府直接负担其在华的一切军事开支，并按 1 : 20“绝对不能有所变更”的汇率向中国支付美元。他最后威胁说：“如果贵国财政部对于上述两项建议均不能接受，则中国只有一可循之途径，就是尽其所能之力量，继续持久抵抗共同之日寇，以竭尽我联合国一分子之义务，关于战时经济与财政，亦只能听其自然之变化。”在递交这份电报时，蒋介石还向高思提出上述要求的最后期限为 3 月 1 日。此后，在华美军的生存和工作只能依靠自己，中国政府将不给予任何帮助与便利。<sup>③</sup>

面对蒋的这一杀手锏，高思主张毫不退让。他告诉赫尔，虽然他不了解目前美国对华承担了什么义务或有何种军事计划，因此

---

① 赫尔致高思电，1944 年 1 月 5 日，同上，第 827—829 页。

② 《中国与外援》，第 283 页。

③ 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4 年 1 月 15 日，《战时外交》(一)，第 361—363 页。

无法建议可向中国施加多大的压力,但他强调“不论目前的形势发展多么不愉快,不论在金钱问题上与中国的分歧是如何的不幸,我们应该坚定立场,不为恐吓和愤慨姿态所胁迫”。<sup>①</sup>

蒋介石 1 月 15 日的答复使摩根索“愤怒之极”。前者停止供给美军在华活动经费的威胁,意味着美国为攻击日本而在华西修建飞行基地的工程将不得不停顿下来,美国的太平洋战略也将因此受到损害。而这正是摩根索和美国军方最担心的问题。

从中美财政贷款争吵一开始,摩根索注意的重点就是美军在华支出问题而非贷款问题,因为在 1944 年 1 月 3 日美国陆军后勤司令布里恩·萨姆维尔访华回国后就请摩根索注意,由于中国方面不合理的汇率(20 法币对 1 美元),美国将为在华活动付出昂贵的代价。<sup>②</sup> 中方这时更有意消极怠工,致使计划中的七个飞机场只有四个得以顺利进行。摩根索无奈,只好求助他的中国同行孔祥熙帮忙。他在 1 月 15 日的电报中强调,“没有任何事情比〔美国人〕了解到中国没有在修建机场工程上充分合作更损害中国在美国的威望了。我坚决相信,在建议立即建造其余飞机场时,我也是在为中国的最重要的利益说话,……应该把美元的兑换问题留待以后再决定”。<sup>③</sup>

摩根索刚把这封电报发出,就接到了蒋介石的上述电报。他认为蒋是在“讹诈”,并气愤地说:他不会为“这伙骗子”去国会山“要

① 高思致赫尔电,1944 年 1 月 16 日,《美国外交文件》,1943 年中国卷,第 837—840 页。

② 这一汇率是 1941 年 8 月双方规定的。但到 1943 年初,美元对法币的黑市汇率已上升到 1 : 40,10 月更上升到 1 : 120。由于美国这时开始在中国修建 B-29 飞行基地,支出倍增。按官定汇率,美方吃亏太大。因此遂在 1943 年底提出解决办法:在维持目前汇率前提下,(1)对美方所付的每一美元,中方另支付 80 元法币作为对联合作战的贡献;或(2)将中方所支付的这 80 元法币算作回惠租借(也称逆租借)。蒋介石尚未同意这一方案,开罗会议就召开了。会上,美方表示愿意承担其在华军事费用,但汇率并没有解决。参阅《美中关系》(中国白皮书)[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The China white Paper)],华盛顿,1949 年版,第 497—499 页。

③ 《摩根索传》,第 113—114 页;另见《战时外交》(三),第 313—314 页。

一个子了”，“让他们跳长江去吧”。他的助手哈里·怀特却警告他，如果不给中国贷款，美国会“损失很大”，因为“牌几乎全在他〔蒋介石〕手中”，美国别无选择。但摩根索打算直接向中国市场抛售黄金来获得法币，用于支付机场工程费用。怀特认为这更危险，因为美方所需法币数量甚巨，蒋介石很容易控制和制裁参与这一买卖的中国商人。摩根索因而束手无策，只好寄希望于军方，“或许现在我们不再需要他们〔中国人〕了”。他打电话给陆军部，诉苦说：“蒋介石……现在用手枪逼在我们头上了。这个问题要认真地从军事上考虑，难道这是我不得不忍受的吗”？<sup>①</sup>

陆军部的回答解脱了摩根索的困境。在军方看来，正值美国压蒋于滇西出兵之际，美国在财政上的任何让步都可能被蒋介石认为示弱的表现，从而影响军事努力。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写道：“中国借助于蒋夫人对罗斯福的影响，压迫我们够厉害的了，……我不再担心中国人现在还会退出战争，因为我们现在关系密切，我想他们目前的要求表明中国人精于讨价还价。”他与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和萨姆维尔讨论后，决定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他们几个都非常不满意美军在中国得到的合作。另外，中国军队进行的实际战斗太少了。萨姆维尔随后告诉摩根索军方这一立场，指出美国给予中国大量援助，但蒋介石却不愿每月拿出相当于325万美元的法币来帮助在华美军。因而军方已决定，如果有必要，美国可以走极端，“停建在华机场，代以从另一方向〔海上〕来攻击日本”。此外，还有许多对付中国的办法。“比如停止向中方供应汽油，或停止驼峰空运；美军甚至可以停止支持蒋介石并花一亿美元去‘收买’他的某个对手而制服他”。<sup>②</sup>根据这一思想，军方代罗斯福起草了一份语气坚决的回电：

① 摩根索与怀特谈话记录，1944年1月18日，《摩根索日记（中国）》，第二卷，第1022—1024页。

② 摩根索与萨姆维尔谈话记录，1944年1月19日，同上，第1027—1030页。

美国充分准备承担在华作战努力的所有开支,包括部队的食宿和建筑。但是,在物价飞涨的时期,我们认为运用固定汇率是不当的。我们的人民和国会无法理解这笔不合理开支的必要性;美国对中国的信心将会动摇。我们关系中的这一变化将是非常不幸的,这不是商业投机问题,而是为相互理解与信任所必需。我们欢迎任何馈赠或回惠租借的安排,据此,我们将承担全部美元代价,同时中国的法币将对我们的这一支出以公平合理的回报。

罗斯福认可了这份电报,只是把“不合理的开支”改为“巨额开支”,同时指出应告诉蒋介石,美国以后每月向中国运送 2500 万美元的黄金,作为 5 亿美元贷款的付现,并承担同样数额的美军在华费用。但他再次强调,不给予 10 亿美元贷款,并重提赴华使团问题,摩根索再次怀疑这种使团的意义。

但国务院对答复蒋介石的电报有不同的考虑。赫尔的政治顾问、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斯坦利·亨培克从政治角度分析了中美之间这场财政危机的深远影响:“我们相信目前讨论的问题极为重要,由此作出的决定及其将要采取的行动,对美国、中国,对战争努力、和平努力以及战后世界都将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我们确信目前的形势下出现的这一问题需要美中两国政府运用最高的政治技巧,特别是对美国来说,尤其如此。”<sup>①</sup>

因此,国务院在 1 月 19 日和 20 日两次与陆军部、财政部联席会议上,对陆军部的电稿提出了异议。它认为,电稿语气“太强硬了”,可能会把中美之间达成任何协议的门堵死。从中美关系政治方面考虑,国务院认为,贷款比接受中国官方汇率更合适;它考虑能否给予中国 2.5—3 亿美元贷款,并派有关使团出访重庆。为此,国务院另草拟了较为温和的电稿。但财政部和陆军部认为,协议之门并未堵死,美国实际上已作出了额外让步,同意承担美军在华作战努力的全部费用。军方代表卢修斯·克莱将军指出,陆军部考虑

<sup>①</sup> 亨培克备忘录,1944 年 1 月 18 日,《美国外交文件》,1944 年中国卷,第 843—847 页。

的不只是付出何种代价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华美军与蒋介石的关系,特别是史迪威在中国的威信问题。如果满足蒋介石的贷款要求,他下次就会要求另一笔新贷款。克莱强调军方已认识到它的电稿“可能会导致美军从中国完全撤出”,但它不在乎,“陆军部已经对自己在中国进行的努力是否值得表示了怀疑”。财政部支持军方立场,认为“蒋介石正在恫吓”。不过它们同意,在基本不改变军方电稿原意的前提下,加上国务院电稿的内容并由后者加以润色定稿。1月20日赫尔和罗斯福批准了最后的电稿,拍发给高思和史迪威。<sup>①</sup>

罗斯福在这份电报中客气地指出,“由于两国相距遥远以及考虑角度不同,可能会有一些因缺少配合而引起对共同问题的争议,进而出现作出不符合两国利益决定的危险”。他欢迎蒋介石派孔祥熙来美协商讨论财政问题。至于美军开支,他告诉蒋介石,业已授权高思和史迪威同意在以后几个月中每月支付2500万美元。最后,罗斯福保证说,鉴于中国财政困难,“本政府已充分准备承担其在华作战努力的全部费用,包括部队的食宿和建筑”。<sup>②</sup>

高思接到这一电报后,并没有立即交给蒋介石。他担心最后一句话会被中方解释为美国将按1:20的汇率来承担在华支出,故急忙向国内汇报,要求删除或修改。24日国务院、陆军部和财政部会商决定,把最后一句改为:“为支付它在华所有军事开支(包括供给和建筑),本政府准备向中国拨与美元,其数额相当于中方根据史迪威将军和高思大使提出的总的安排所支付的中国货币。”<sup>③</sup>这

① 国务院、陆军部和财政部三方讨论记录,1944年1月19日,20日,财政部记录见《摩根索日记(中国)》,第二卷,第1031—1032,1035—1037页;国务院记录见《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847—850,855—856页。

② 赫尔致高思电,1944年1月20日,同上,第859页。

③ 高思22日才接到陆军方面转来的赫尔20日电,因为国务院的通讯渠道不够畅通。高思的回电也利用了陆军的电台,见陆军部转国务院重庆来电,1944年1月24日,同上,第860—861页;三方会议记录见《摩根索日记(中国)》,第二卷,第1039—1041页。

样，美国的拨款与否和多少就要看中国方面垫款的情况而定。

这一电报迟至 26 日才交给蒋介石。后者在 2 月 2 日的回电中，语气变得和缓，不再提贷款问题，声称军事开支问题将由孔祥熙来华盛顿直接与摩根索交涉。<sup>①</sup> 在重庆，孔祥熙接受了美方提出的过渡性办法，即美方用 2500 万美元以 1 : 40 比价购买法币 10 亿元，同时中国另贡献 15 亿。这样实际上是 1 美元换 100 元法币，从而解决了 1 月份美军在华开支问题。但孔拒绝以此作为以后几个月的解决办法。<sup>②</sup>

虽然危机暂时缓解，但双方艰难的讨价还价及其对中国经济的灾难性影响还在后面。

### (三)

1944 年 2 月 3 日孔祥熙提出中方解决美军在华开支的新建议：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中方愿意以回惠租借的形式对每一美元再贡献 10 元法币。他强调，汇率变更必然导致更加剧烈的通货膨胀。而目前通货膨胀加剧的主要责任在于美国在华开支的不断增长，特别是在成都等地修建机场的结果。他还指出，中国给予美国在华活动的帮助，实际上已经偿还了先前的 5 亿美元贷款。最后，孔祥熙暗示，中国可能因为经济危机而崩溃，因此不得不与日本单方面媾和，后者已经“开出了一些很好的条件”。<sup>③</sup>

高思在向赫尔汇报中方上述立场时指出，他和他的大使馆同仁财政部代表 S · 爱德勒、军方财政顾问 E · 艾奇逊一致认为，中国政府根本不想就军事开支问题达成一项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

<sup>①</sup> 罗斯福与蒋介石来往电文，1944 年 1 月 26 日，2 月 2 日，《战时外交》(一)，第 368，367—340 页。

<sup>②</sup> “中国汇兑情况摘要”，1944 年 5 月 17 日，《中国白皮书》，第 500 页。

<sup>③</sup> 孔祥熙致高思函，1944 年 2 月 4 日，《战时外交》(一)，第 372 页；高思致赫尔电，1944 年 2 月 4 日，《美国外交文件》，1944 年中国卷，第 368—370 页。

“美国政府只能准备不惜减少和停止我们与中国财政、外交和军事上的合作来坚持自己的建议”。否则，美国难以在未来谈判中占据主动。最后高思还提出了一个关键性问题：美国在华军事活动是否对打败日本至关重要？如果是，美国就别无选择，只能迁就中国；如果不是，美国就可以对其施加压力，把中美关系建立在“一种合情合理的互利基础之上。大使馆相信，建立这样一个基础，不仅对作战努力，而且对战后中美经济政治合作都是必要的”。<sup>①</sup>

高思的报告促使华盛顿重新考虑中国战略位置和美军在中国的计划。国务院、财政部和陆军部都同意，军事上的必要性是决定对华政策的首要考虑。国务院认为，美国的强硬立场应有所节制，以避免任何会导致蒋介石垮台的行动。财政部坚持除非出于军事需要，否则绝不接受1：100以下的汇率。这样陆军部的立场将起关键作用。它在分析了太平洋和中国战场最新发展之后，通知国务院和财政部说，由于美军在马绍尔群岛进展顺利，因而可能将进攻中国海岸港口的时间表提前几个月。正是考虑到这一进攻计划，才在中国内地修建战略空军基地。这样一来，这些基地价值比几周前显得更为提高了。出于这一需要，陆军部决定批准其重庆谈判代表向中方提出的建议：在不承认官方汇率前提下，向中国支付2500万美元，因为中方已在2月14日为美军垫付了10亿元法币。很明显，军方这时放弃了原来退出中国的考虑，但它不想在汇率问题上作出让步。国务院和财政部附和了它的建议。20日，陆军部通知史迪威：继续在汇率问题上坚定立场，美方只能以合理的汇率承担全部费用。国务院也指示高思，孔祥熙的建议是“不现实和不令人满意的”。<sup>②</sup>

① 高思致赫尔，1944年2月12日，同上，第871—872页。

② 三方会议记录，1944年2月14日，19日，《摩根索日记（中国）》，第二卷，第1054—1055，1058—1059；“中国汇兑情况摘要”，1944年5月17日，《中国白皮书》，第501页；代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至高思电，1944年2月19日，《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873—874页。

鉴于中方拒不接受美军方驻华代表的建议,同时美国又不打算从中国撤出,陆军部因而考虑用军事办法制裁中国。但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种制裁太强烈,希望财政部提出较为适宜的财政制裁措施。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再次作出让步姿态。孔祥熙提出,由美国空运 2000 万美元到中国,预支美军在华开支,汇率以后再订。这笔钱将用于向黑市抛售,以压低法币的汇价。<sup>①</sup> 于是,2月 29 日国务院、陆军部和财政部会商,考虑到中方不再坚持 1 : 20 汇率,它们决定:(1)立即向中国支付 2500 万美元作为 2 月份美军在华开支;(2)向印度空运 2000 万美元,其中 500 万交由孔祥熙在中国市场进行试验性抛售,以抑制日益上升的汇率。其余数额待汇率协议达成后再支付,以加强美方谈判地位。<sup>②</sup> 美国的这两项决定给中方提供了一个台阶,3月 2 日孔祥熙表示同意美国的安排,并称只要美国能运来足够的钞票,中国将为美军 3 月份的开支提供 50 亿元法币。<sup>③</sup>

这时,中国市场上美元与法币的汇率已上升到 1 : 220。美国驻华使馆担心,美军在华支出的不断增加,很可能会危及中国经济,从而最终破坏美国在华军事计划。虽然这一巨额开支不是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但它却恶化了这一形势。蒋介石对目前中美谈判僵局已不耐烦了。因此,高思和史迪威等人在 2 月底提出一项临时解决办法,以三个月为期,中方先付美军法币,美方则付相当的美元,实际汇率大概在 1 : 100 到 200 之间。为稳定中国货币起见,美国对其所得法币数量秘而不宣,同时公布美国对中国“贡献”的美元。高思把这一建议视为与蒋介石谈判最现实的基础。预计美军机场将在 4 月 15 日基本完工。S·爱德勒评论说:“4 月 15 日

<sup>①</sup> 怀特致摩根索备忘录,1944 年 3 月 1 日,《摩根索日记(中国)》,第二卷,第 1080 页。

<sup>②</sup> 三方会议记录,1944 年 2 月 29 日,《美国外交文件》,1944 年中国卷,第 882—886 页。

<sup>③</sup> 高思致赫尔,1944 年 3 月 3 日,同上,第 888 页。中国的法币当时是在美国印刷的。

后基地和头痛问题〔指汇率〕兼得要比只有头痛问题而无基地要好得多。”2月30日美国内有关三方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同意加快黄金运华出售，以回笼货币。<sup>①</sup>

中国对这一建议不置可否，但美国人最关心的基地建筑则开始顺利进行。5月初，孔祥熙又向美国驻华代表提出新建议。他仍坚持以官方汇率为基础，中方对每一美元提供40元法币的回惠租借。然而，美方坚持按1：150的汇率订三个月的协定。孔祥熙遂决定与华盛顿直接打交道。5月19日他致函摩根索，在作出和解姿态的同时，阐明了中国作出的贡献与面临的困难。他指出，中国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1942年9月到1944年4月间已为在华美军花费了17894260457.95元法币。中国对整个问题的“基本态度并不想讨价还价”。他强调，“中美已经并肩战斗了三年”，有理由继续为共同事业各尽其力。他提出若干种供美国考虑的建议，诸如美方在华出售美元、黄金、债券来回笼法币。并且，他第一次明确表示不再寻求新贷款，但暗示希望得到美国战后的援助。<sup>②</sup>

摩根索认为孔祥熙上述态度是“这一问题上最积极可取的反应”。他与陆军部和国务院会商后决定，4、5两个月的美军支出仍以2500万美元为限，但暂不作最后决定。摩根索客气地回答说：“贵部与财政部间友好的关系是我们两国政府齐心协力解决问题的反映。我们相信我们将抱着同样的合作精神来解决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在华美军谈判代表却没有这种合作精神，他们仍不希望立即向中国支付拖延已久的2月份的2500万美元。在他们看

① 高思与赫尔来往电文，1944年3月8日，11日，23日，《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894—896,898—899,904—907页；怀特致摩根索备忘录，《摩根索日记（中国）》，第二卷，第1085—1086页；史迪威致萨姆维尔电，1944年3月27日，《中国白皮书》，第495—496页；高思与赫尔来往电文，1944年3月28日，4月5日，《美国内外交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909,964页。

② 孔祥熙致摩根索，1944年4月19日，此信与“中国大使馆致美国财政部备忘录”一起在5月19日交给美方。《美国内外交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915—917,921—922页。

来，这会削弱美方谈判地位。国务院认为再拒付这笔款子，可能会引起中国人对美国动机的猜疑，影响中美关系的全局。三方会议最后决定，由于孔祥熙即将赴美参加布雷顿森林国际金融会议，因而可以把陷入僵局的谈判由重庆转到华盛顿，请摩根索代表军方直接与孔祥熙会谈。<sup>①</sup>

摩根索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感到美军在华支出以及相关的汇率问题上的中美关系危机可告一段落。6月8日他兴高采烈地告诉罗斯福：“藉此度过一次严重军事危机之际，我应该向您表示祝贺。……美国在华飞行基地已经完成，你在1月份所遇到的难题也已解决，你的主要目标业已实现。……我们目前处于有利的谈判地位，……你现在可以放心，尽管财政问题影响了中美两国坦诚的关系，但目前财政谈判的过程是令人满意的，并向正确方向发展。”

他还为此替罗斯福草拟了一封信，向蒋介石表示谢意。但后来的发展肯定会使摩根索后悔这样做。<sup>②</sup> 中美两国在美军支出问题上的争吵虽告一段落，但这一争吵的后遗症却影响了中美间的另一件金融大事——美国黄金运华。美国财政部的停运政策使中国付出了巨额代价。

#### (四)

1944年3月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和陆军部三方会议一致同意的加速黄金运华，以制止恶性通货膨胀的决定，并未得到执行。美国财政部官员有意停运黄金，以发泄他们对中国政府在美军支出

① 三方会议记录，1944年5月26日，6月7日，《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923—924,926—928页；赫尔致高思电，1944年6月7日，同上，第926页。

② 摩根索致罗斯福函，1944年6月8日，《摩根索日记（中国）》，第二卷，第1136页，罗斯福致蒋介石电，1944年6月10日，同上，第1137页。

方面不与美方合作的不满。<sup>①</sup>

黄金运华问题首先是和美国 5 亿美元贷款及中国的售金政策相联系的。1942 年 5 月中国财政部在讨论如何利用 5 亿美元贷款时，中央银行的席德懋提出用贷款之一部在美购金，然后运回国内出售，以回笼货币。这一建议得到美籍顾问杨格的支持及孔祥熙的批准。中方遂向美国要求从 5 亿贷款中拨出一部分以黄金形式付给中国。美财政部虽然对售金的有效性表示怀疑，但还是在 1942 年底后同意向中国运送价值 2000 万美元的黄金。这批黄金尚未运出，1943 年 7 月孔祥熙又要求美方同意再拨价值 2 亿美元的黄金给中国，并称宋美龄 6 月份访美时，曾当面征得了罗斯福对这一建议的认可。<sup>②</sup>

摩根索虽然再次怀疑售金政策的意义，并警告中国可能会因此失去战后发展所急需的宝贵的基金，但他在向罗斯福证实这一计划后，还是对孔祥熙正式表示，只要运输工具许可，美国将随时向中国提供它所需要的黄金。摩根索之所以同意，一是由于罗斯福业已首肯，二是 5 亿贷款所有权实际上是属于中国的，并无任何动用程序上的条件限制。摩根索不那么情愿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相信只要这笔贷款还留在帐面上，“美国政府就总能拴住中国”，而中国也恰恰担心，一旦战争结束时，这笔贷款还没有用完，美国随时可能收回。<sup>③</sup>

1943 年 9 月，中国开始在国内出售黄金，到年底，美国最初答应的 2 千万美元的黄金中已有 1050 万美元黄金抵华，售金效果良

① 美国财政部货币政策司司长怀特曾应陆军部的要求在 1944 年 2 月 29 日向后者提出若干种对华财政制裁的办法，但笔者所见之文献均未列出具体内容，参见三方会议记录，1944 年 2 月 19 日，《美国外交文件》，1944 年中国卷，第 886 页。但从停运黄金的情况来看，这无疑是制裁办法之一种。

② 摩根索致爱德勒电，1943 年 12 月 29 日，孔祥熙致摩根索电，1943 年 7 月 8 日，《中国白皮书》，第 485、486 页。

③ 摩根索致罗斯福函，1943 年 7 月 15 日，摩根索致孔祥熙电，1943 年 7 月 27 日，同上，第 486—488 页。

好。1944年初,由于修建成都等地的美军机场等原因,中国的通货膨胀开始恶性发展,购买黄金进行投机的越来越多,中国要求美国加快运金速度,以跟上售金的步伐。罗斯福在1944年1月向财政部指示,希望能把每月运金数量提高到2500万美元。但财政部具体负责运金的官员怀特等人以缺少运输工具为由并没有去这样做。1944年上半年美国只向中国运送了总计2500万美元的黄金,其中只有一半在6月30日以前抵达中国。<sup>①</sup>

这时中国国内经济更加恶化。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日本军队逼近贵阳,震动陪都重庆。一时间人心浮动,出现抢购黄金浪潮,致使黄金供不应求,一再售缺。国民政府拒不采取其他积极的稳定措施,一味寄希望于美国黄金可源源抵华,遂出售黄金期货。官方黄金售缺,黑市金价自然暴涨。但黄金期货价格是不变的,期货与黑市价格的差价酿成“黄金风潮”,权贵阶层、不法商人大肆投机牟利,重庆市场上一片乌烟瘴气。中国一再向美告急,美国却愈加慢慢吞吞。本来就对无条件贷款不满,对售金政策持怀疑态度的美国财政部官员,了解到中国混乱的售金活动后,就更有理由拖延了。<sup>②</sup>况且,当时中美财政部仍就美国在华支出的计算问题争论不休。

1944年6月底,孔祥熙作为中国代表赴美参加联合国家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美之间有关美军在华开支的谈判也随之由重庆转到华盛顿。结果这场谈判又持续半年之久,大大超过了中美双方的预料。

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再次反映了中美两个盟国在金融问题上看法的分歧。虽然先前的信任危机平息了,但双方的隔阂并未消除。国民政府参加谈判的目的很明确,尽可能多地从美国那里要钱。孔祥熙明确告诉希望他加快谈判速度的蒋介石说,“弟以年来

① 《中国与外援》,第321—323页。

② 同上,第324页。

发行激增，有机增厚准备，不惜任何艰辛，相以周旋，非得有利时机，不欲轻易放过”。<sup>①</sup>

代表美国陆军部出面谈判的摩根索却不想作出任何重大让步。他坚持美国所能给予的只能是中国应该拥有的并能够加强中国军事上抗战的东西，决不同意任何需要美国纳税人出钱的额外索取。当时驻华美军告诉他，中国在1944年2—6月间为美军支付的垫款为136亿法币，相当于1.15亿美元（美方已付2月份的0.25亿美元）。这笔钱已经相当于美军在美国内获得相似服务的价格。根据这一估计，摩根索在7月向孔祥熙提出，美国愿为2—6月五个月的中国垫款支付1.25亿美元，并准备为以后三个月（7—9月）支付0.6亿美元，两项合计1.85亿美元，成都等地机场的建筑费用也包括在内。但孔祥熙坚决不同意这项安排，强调成都机场费用（41亿法币）应另计，这才符合罗斯福1月12日电报中承诺的精神。摩根索则认为，这种解释毫无道理，如果要美国承担这笔费用，也应记入回惠租借（或称逆租借）帐中。双方僵持不下，摩根索只好说：“我们目前唯一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等待。”<sup>②</sup>

但在重庆的蒋介石却有些急不可耐了。当时正是中国东部战场危机，大后方吃紧的时候。8月3日他向孔祥熙询问交涉事宜，强调“务望从速解决，不必过于争执，如能于法币百元至百廿元之间换得美元亦可。此事不必待罗总统之协助也。否则每月垫付美军之款积累更多，而币值更落，则经济财政更难为继也”。显然，从稳定中国经济，加强抗战事业考虑，应该尽早解决这一问题，接受美国的安排。但孔祥熙这次却违背了蒋的指示，谎称美各方首脑“皆表愿为公允解决，惟军需主管各方为难”。他还指出，按美方目前答应的付款项计，汇率已在78元法币对1美元了。现在争论

---

① 孔祥熙至蒋介石电，1944年10月16日，《战时外交》（一），第197页。

② 《摩根索传》，第288—290页；孔祥熙致蒋介石电，1944年11月27日，《战时外交》（一），第381—382页。

的问题是成都机场费用是否另算。蒋介石再次指出：“成都机场经费不必坚持争执，即照对方所提在一亿两千五百万美金之内亦可结束，总以速了为是。”<sup>①</sup>

孔祥熙再次抗命，他决心在机场费用上敲美国人一笔。他一方面敷衍蒋介石的催促，谎称摩根索一人作不了主，主管各方人员因休假难以会齐；另一方面通过游说白宫向摩根索施加压力，催其从速解决。尽管美国军方认为，它已通过有关承包合同支付了大部分成都机场的工程费用，摩根索还是决定作出些让步，与军方拟定了美国最后方案。为了防止孔祥熙再次利用华盛顿有关机构的互相牵制，摩根索事先征得了罗斯福的同意，以及国务院和陆军部的支持。11月25日他把美国的最后决定通知给孔祥熙：美国在1.85亿美元基础上再增加0.25亿美元作为赠与，成都机场费用记入回惠租借帐。摩根索威胁说，如果中方还不同意，他将洗手不干了，由中方直接和陆军部打交道去。孔祥熙还想拿罗斯福1月22日电报来压他，摩根索不予理睬，认为自己的建议是符合这一电报精神的。到这时孔祥熙才只好同意接受美方安排。他的目的达到了2.1美元现款到手，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大约是80：1，而自由市场上已达到200：1以上。<sup>②</sup>

美国最终虽然作出这一安排，但摩根索等人则认为至少有0.25亿美元是国民政府没有资格得到的。孔祥熙为这笔钱付出了重大代价。对国家而言，拖延半年之久的谈判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经济，并加强了美国停运黄金来华的决心。只是在中国的一再争取下，美国财政部才在1944年11月3日和12月1日分别由海路向

---

① 蒋介石与孔祥熙来往电文，1944年8月3日，8月5日，8月8日，同上，第377—379页。

② 孔祥熙致蒋介石，1944年9月5日。蒋当时对孔有些不耐烦了，他在这份电报上批道：“垫款问题望速解决，务请于双十节到渝，勿延。”同上，第380—381页；《摩根索传》，第290—291页；孔祥熙致蒋介石，1944年11月27日，《战时外交》（一），第281—282页。

中国运出 300 万美元的黄金，而以前黄金都是空运来华的。<sup>①</sup>

1944 年底怀特就黄金运华问题向摩根索指出，目前中国的售金方法主要得益者是“投机居奇者”，并将有很多黄金流入沦陷区，“实际上对缓解通货膨胀的局面毫无作用”。虽然重庆政府从中得到了一笔额外的岁入，但这却是“靠以极低的价格牺牲国家的资产”实现的。他进一步指出，尽管中方已施加了要求运金的压力，但财政部还是要坚持停运。这可以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武器”，来使重庆接受“你的中国计划”。<sup>②</sup>

摩根索同意怀特的看法，但他决定把新任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的意见作为财政部政策的指南。运金政策将根据赫尔利的意见而定。1945 年 1 月 8 日，他指示财政部驻华代表 S·爱德勒，财政部不同意中国提出的交运 1.9 亿美元黄金的要求，因为目前中国局势未稳定，战后中国更需要这笔资金。摩根索要爱德勒与赫尔利全面讨论这个问题，并尽快向财政部报告他的意见。不久赫尔利回答说，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来看，他都支持停运黄金的措施。赫尔利显然也是不满意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并希望用黄金问题促使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和解。<sup>③</sup> 结果，黄金运华一事直到 1945 年 4 月宋子文访美时才最终解决。

## (五)

这场发生在中美同盟间的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二战期间反法西斯盟国关系中所仅见的。其对抗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苏联与美英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的冲突。

从表面上看，危机是由于西方盟国取消“海盗”计划引发的。但

① 《中国与外援》，第 324 页。

② 《中国与外援》，327 页。

③ 摩根索至爱德勒电，1945 年 1 月 8 日；赫尔利致国务卿电，1945 年 1 月 7 日，《美国外交文件》，1945 年中国卷，第 1055—1056 页。

从根本上说，它反映了中国与西方盟国相互之间存在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西方国家在制订和取消“海盗”计划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战场的轻视极大损伤了中国领导人的自尊心。以此为契机，中国对于西方援华不力的不满情绪一下子全部爆发出来。

中国在孤立地抵抗日本侵略四年之后，西方盟国才被动地卷入对日战争。甚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仍是口惠多于实际，政治宣传多于军火援助。正如亨培克所分析的那样，不管蒋介石是否在“威胁”或是“作姿态”，他的行动表明，他感到中国在经过6年艰苦抗战之后，已经精疲力尽，需要美国的帮助。蒋还相信，只要愿意，美国是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帮助中国的。但现实却使蒋介石相信，美国并没有用“与英国人和俄国人打交道的同样精神、方法和形式，来与中国人配合与协调”。<sup>①</sup>因此，蒋介石的主要不满在于美国没能平等地对待中国。同时中国的财政也的确是困难重重。

长期的战争几乎摧毁了本来就不强大的中国经济。而美军在华的庞大开支更加深了政府的财政危机。国家和社会有限的财力实难承受日益增加的战争负担。中国的确需要美国的财政援助。就连驻华美军的财政顾问E·艾奇逊都认为，“应该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特殊环境和条件来考察”中国的求援要求，“即一个从来没有彻底统一过的经济，而这一松散的经济结构还为长达六年之久的战争破坏，因战时中国商业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而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食物和供给分配以及适当运输工具的缺乏；政府对物价几乎没有控制；商人、承包人和官员的腐败以及他们之间的勾结在〔飞机场〕建设和供给中习以为常”。<sup>②</sup>

<sup>①</sup> 远东司司长亨培克备忘录，1944年1月18日，19日，《美国内外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843—847页。

<sup>②</sup> 高思致赫尔电，1940年2月24日，《美国内外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874—876页。

在如此恶劣的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还是为美军在华开支及成都机场建设提供 331.565 亿元法币的垫款,而当年中国政府全年岁入不过是 200 多亿元法币。<sup>①</sup> 为建设美国空军基地,中国政府征调了四川 50 万青壮年民工,用最原始的办法肩扛手提,如期完成了基地建设。当时正值春种,这种抽调大批民工的作法对当地农业生产的破坏是可想而知的。<sup>②</sup>

如果美国及时向中国支付美元以抵销中国政府的垫款,并及时向中国运送它所需要的黄金,或许可以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但由于中方,特别是孔祥熙顽固坚持固定汇率,致使有关协议迟至 1944 年底才达成,导致只有庞大的法币垫款而无相应的美元进帐,结果加重了恶性通货膨胀。尽管坚持固定汇率有其制度上的原因,汇率的变动会影响法币的信誉,从而加速通货膨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孔祥熙想报复美国拒绝贷款的行动,以不合理的汇率去补偿没有得到的贷款。为了多争取 2500 万美元,孔祥熙不仅违反蒋介石的指示,而且导致美国停运黄金,拖延美元支付,最终让国家付出通货膨胀恶性发展的代价。这实在是得不偿失。

从道义的角度看,似乎很难想象美国军方和财政部在处理这场危机时会对中国这样一个被罗斯福扶为“四强”之一的盟国考虑和实施军事和财政制裁。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考虑和作法典型地反映了美外交中的强权政治因素。

应该说,美国决策者在处理这次危机中也考虑到经济因素。高思就曾担心,如果接受中国的 1 : 20 的固定汇率,美方每月须支付 3 亿美元,“中国战场最终将是这场战争中最昂贵的战场”。<sup>③</sup> 但总

① “对美回惠租借案经过概述”,1945 年 2 月 24 日,孟默然编:《美蒋勾结史料》,新潮出版社,1950 年版,第 303 页。

② 成都美军机场建设对当地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可参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10、17 期中有关文章。

③ 高思致赫尔电,1944 年 2 月 24 日,《美外交文件》,1944 年中国卷,第 874—876 页。

的来说，正如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财政部三方联席会议所确定的那样，经济考虑是处在军事和政治考虑之后。就数量而言，相比较美国战时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外援项目，10亿美元不是个大数字。引起美国决策者不满的不是贷款的数量，而是中国方面寻求贷款的方式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在他们看来，蒋介石1月15日电报中所表明的“不给钱就不合作”的立场极为有害：如果屈服于蒋的压力，从军事讲，会直接影响史迪威在华的威信，以及罗斯福压迫蒋介石出兵缅北的努力；从政治讲，它会在美中关系中创下了一个有害的先例，削弱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地位，甚至损害美国控制中国战后发展的能力。相比之下，拒绝蒋介石的要求并不会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反而会让中国领导人清醒，从而把美中关系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对美国决策者来说，蒋介石早先有效地使用过的退出战争的威胁已经失效。没有人会相信中国会在盟国打败轴心国胜利在望的时候退出战争。蒋介石即便是停止与在华美军合作，它给美国造成的损害也是有限的，因为自“海盗”计划取消起，中国战场在美国太平洋战略中的地位日益下降，至1944年5月美国最终决定采取从太平洋进攻日本的新战略，代替早先以中国大陆为主战场打败日本的计划。<sup>①</sup>

从表面上看，这场危机一度发展到结束中美抗日合作的边缘，但仔细观察，中美双方并没有准备决裂。在大敌当前，结束抗日同盟的代价远远高于维持它。对蒋介石来说，不管是退出战争的暗示，还是提出拒绝帮助在华美军的威胁，都是以不与美国闹翻分手为限，特别是在1944年4月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以后更是如此。中国不得不软化其对美立场。毕竟，中国政府不想，也不能失去美

---

<sup>①</sup> 中国战场地位下降问题可参见《史迪威事件》，第209—215页，时殷弘：“开罗会议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欧美史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69—72页。

国这个政治上的靠山，军事上的盟友和经济上的财源。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政府的举措的确如摩根索所云是在“讹诈”。

同时美国也不打算与中国决裂。军方虽然一度考虑过从中国撤出，但旋即放弃这一想法，因为这种撤出不仅意味着放弃美国在华军事努力，也意味着中美抗日同盟的破裂。只要战争尚在进行，美国就不会愿意放弃中国战场，无论中国战场的价值是多么低。况且，在美国领导人看来，在战后亚洲及国际事务中，中国是其唯一可靠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和苏联扩张主义的伙伴。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曾明确指出：“在有关打败日本及其以后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安全安排等问题上，中美两国之间比其他任何列强有更多的利害一致。中美两国的想法和愿望比其他列强都更为接近。”考虑到战后美国与英国、苏联的关系会变得紧张，“美中能否在四强之中站在一起尤为重要。……战时战后中美两国都有主要的共同利益”。<sup>①</sup>因此，美国又不能不适当地考虑中国的财政要求。正如艾奇逊所分析的那样，“如果因美国在华军事开支问题而把中国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美国可能还要花更大的代价帮助它重建”。<sup>②</sup>这又决定了美国在后来的谈判中不能不接受中国的若干要求。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① 国务院准备的文件，1943年12月27日，《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484—489页。

② 高思致赫尔电，1944年2月24日，《美国外交文件》，1944年中国卷，第874—876页。

---

# 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

李嘉谷

---

## 一、七七事变后中国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中苏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苏联援华抗日的政治基础。随即中国政府派遣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为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为副团长的“考察苏联实业团”赴莫斯科求援。实际上杨杰率领的是一个中国军事代表团。1937年10月下旬，苏联援华的首批飞机已飞抵中国，接着，苏联的飞机、大炮、战车、机枪、汽油等大批军火物资便陆续运抵中国。苏联还派遣军事顾问、军事技术专家与空军志愿队来华帮助抗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抗日战争前期，当英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时，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不仅是及时的，而且作用巨大，它帮助中国抵挡住了日本的战略进攻，使日本侵略者深深陷入中国的抗日战场而不能自拔。

但蒋介石对苏联的最大希望还在苏联能直接出兵对日作战。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亲自召见派赴莫斯科谈判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时，指示：“其任务为促进苏联参战，所谓促成互助协定是也，其最低希望俾苏联源源接济我军用品，如飞机、高射炮、